

書

法

叢

刊



书法丛刊

第四辑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辑由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

封面设计 曹辛之

封面题字 黄苗子

装帧设计 施 闾

书 法 丛 刊

第 四 辑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1/16 印张：6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68·1074 定价：1.80元（胶版纸）
~~1.40元~~（凸版纸）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书法丛刊》是为了满足书法专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研究和欣赏的需要而编印的。

《书法丛刊》发表古代书法作品，同时适当发表书法的专题研究文章以及与本辑作品有关的分析介绍。暂为不定期。本辑所收的碑志，大多是建国以来清理发现或新近出土的。这些碑志、墨迹中的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皆富有研究、欣赏和临习价值。

《书法丛刊》的编选工作怎样才能做得较好，我们诚恳地希望不断听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文物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书法丛刊

4

目 录

东汉 建宁残碑

王泽庆

6

梁 桂阳王萧融夫妇墓志

8

梁 《萧融墓志》

8

梁 《王慕韶墓志》

10

略谈北魏司马悦墓志的书法

启真

12

北魏 《司马悦墓志》

13

唐 《等慈寺碑》

马宝山

16

唐 《昭仁寺碑》

19

昭陵新发现的三通唐碑的书法艺术

孙迟

26

唐 《周护碑》

27

唐 《李孟常碑》

36

唐 《吴广碑》

41

『千唐志斋』志石选粹

郭也生

48

北魏 《元恭墓志》

49

隋	《尔朱端墓志》	52
唐	《祔墓志》	54
唐	《田夫人墓志》	55
唐	《盖蕃墓志》	56
唐	《崔玄籍墓志》	57
唐	狄仁杰书《袁公瑜墓志》	58
唐	《孟玄一墓志》	59
唐	《杨法师生墓志》	60
唐	《齐子墓志》	61
唐	《崔澄墓志》	62
唐	李捶书《李夫人墓志》	63
宋	范澄书《石祖方墓志》	64
宋	李师直书《范子猷墓志》	65
宋	范坦书《范辉墓志》	66
宋	蔡襄书《诗札册》	67
明	祝允明草书诗卷	82
	单国强	
	穆益勤	

东汉 建宁残碑

王 泽 庆



一九七六年冬，山西临猗县城关公社翟村出土东汉石碑残段，长六七、宽四三、厚二八厘米。现藏运城地区博物馆。碑文残存六行五十字：

「□致□

遂放遣米

曹守绌邑长平阳□□本心末

瑛少子熹窃晞商鲁因忧素造庶述□

□六□强弱匪倾迈去遗爱民有谣声

建宁元年九月辛酉

翟村，据县志传说和唐长庆二年长孙脩《汉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因汉翟方进及家族葬此而得名。《碑表》云：「昔时猗氏城西五里，曰汉故丞相高陵侯翟公沛方进字子威之墓。……汉成帝器其能，擢拜丞相。公，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飭法律，故汉号为通明相。」可是在绥和二年（前七

东汉 建宁残碑



东汉 建宁残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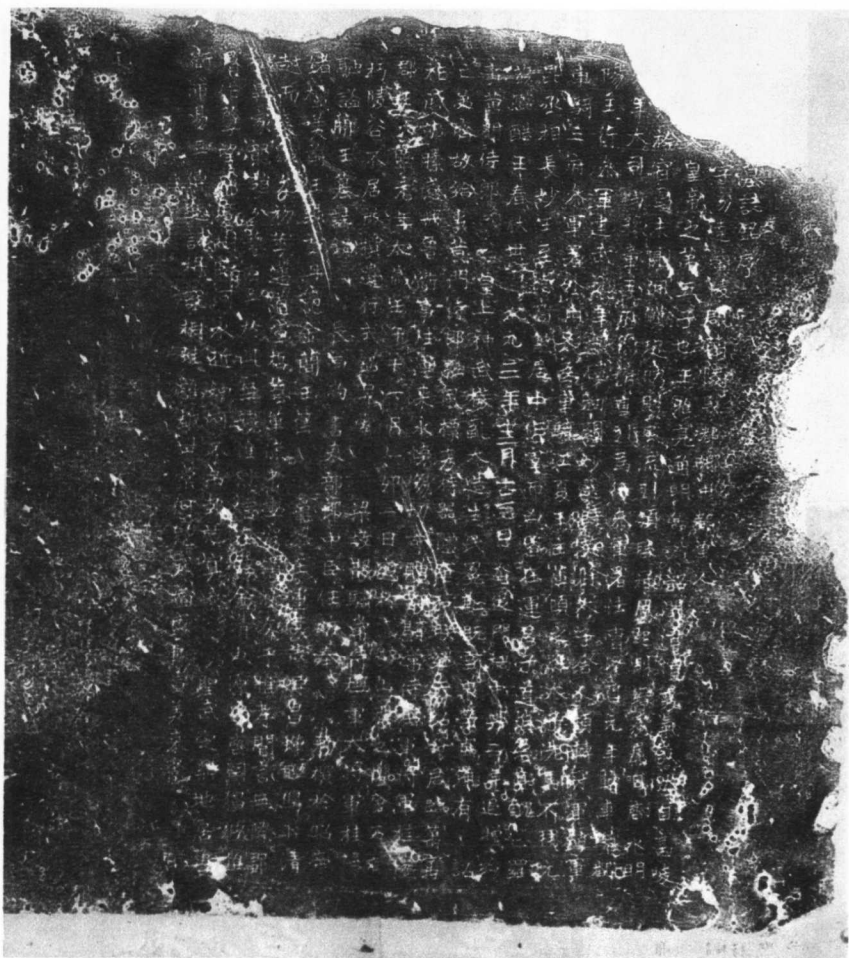
年），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翟方进被迫自杀。死后，归葬于其故乡上蔡。王莽摄政，翟方进的次子翟义，以东郡守扶顺讨逆，师败被诛。据史书上讲，由于东郡之败，翟氏祖坟被掘，公尸骨遭弃。以后改葬于此。发掘此墓时，发现系翟氏几代的合葬墓。

临猗东汉残碑，左下保留「建宁元年（一六八年）九月辛酉」年号，即是立碑时间。距翟公父子之死已一百六十多年。至于这块汉碑被毁时期，据《碑表》记，唐时李怀光叛乱，建宁汉碑「折坠草莽」湮没。由于该残碑长期埋在地，下，免受风化，碑面平整，字迹清晰。

此碑在书法发展史上，对研究隶书的演变、魏碑的兴起，有参考价值。残碑书法，正是隶书「拙朴渐消，巧美渐增」阶段的体势。字体方劲工致，点画刚健有力。结体笔法，富于变化。刻工精细，可窥见书写用笔的踪迹和点划的轻重顿挫。

此碑立于建宁元年，距今一千八百余年。与孔林《史晨碑》年相若，貌相似。这两块汉碑同属工整谨严一类，笔画秀雅端整，书写从容熟练而不板滞，各臻其美。

梁 桂陽王蕭融夫婦墓志



梁 蕭融墓志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南京太平门外宁栖公路北面，发现了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弟、桂阳王萧融与其妻王慕韶夫妇的合葬墓。墓道中出土了萧融和王慕韶的石刻墓志各一方。

萧融墓志，长六〇、宽六〇、厚九厘米。一面刻文，共二十行，满行二十八字。刻于梁武帝天监元年（五〇二年）。除开头部分残缺缺字外，其余字迹尚属清晰。

桂阳王妃王慕韶墓志，长四九、宽六四、四、厚七·五厘米。一面刻文，共三十一行，满行二十三字。刻于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年）。现字迹完好。

这两方墓志是迄今所出土之梁代墓志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除志文内容重要史料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是研究我国六朝时期书体演变的珍贵依据。两志皆为楷书，但仍有隶书的余意。王慕韶墓志的楷法尤显成熟和精美，可以说，它是南朝时期特有的书法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根据南京地区出土的六朝墓志分析，东晋时期书法的主流尚属隶书阶段，但楷书的笔意已开始出现，到了南朝，即发展到以楷书为主体的阶段，但仍有隶书的遗意。从萧融及王氏墓志的出土，这种认识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字分達蘭陵周朝陵縣都鄉中都重人
 皇帝之第五子也王雅亮通明器詔
 衿官昌未與師範玩助財民流引領
 羊大司馬祿章王所給指重引為侍
 陽王行參軍建武元年封初關妙選
 車騎三府參軍署外郎又為軍機工
 昆丞相長妙王至德初居中外宰而
 事黃門侍郎一皇上神武機亂大造
 亡弟齊故給事黃門侍郎融風標秀
 社感亦滕感與魯衛事姓連來永懷
 郡葬大監元年太為王年十一月
 朽陵谷不居改撰遷行式銘泉室
 融諡蘭王墓誌銘長官尚書吏部
 緒檀美前王葬丹記金蘭王墓
 龕於在運

梁桂陽國太妃墓誌銘 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主陳造
太妃姓王諱慕韶南徐州琅瑯郡臨沂縣都鄉南仁里人也
周儲命氏世載聖德清源華韓派別綿昌祖深新安太守父
僧聰黃門郎封冕承業映尊前軌太妃識備幽閑體含貞粹
履四德之淳範播七行之高風 皇基積祉本枝克盛岐
陽之功載遠隆姬之祚在焉翁幣思賢允歸御族既霄燭有
行降禮中饋親理微漠躬事組紉慶不踰閭行必待傳聞儀
觀則娉列承風齊季昏虐時惟文喪蘭玉保摧人絕已絕太
妃援鏡貶良 鸞興辭慘深恭姜慟均杞室 我皇啓聖
天應符英命賢言唐衛利建維城簡王無嗣以宣武王第九
于象繼世采封為桂陽主天監三年十二月策命拜桂陽王
太妃文曰於戲維爾令德克昭靜恭靡忘式策蕃序允樹
徽是故遵以朝序用申彝服往歆我其茂休烈可不慎歟太
妃禮秩愈重身志弥約奉止謙恭率下冲素傍無薰飭服有
卑纖慈撫均愛如斯教範雖斷摽貽訓平反有悅無以加焉
報施空云暉塵冀謝天監十三年十月丙子朔廿日己未薨

春秋卅二有詔曰桂陽國太妃奄至薨隕追痛切劓不使
臨哭喪事所須隨中備緘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其年九月
月丙午朔十日乙卯制定式辟里太辟山年序大經後
速俾茲不校茲烈是鑄其辭曰
萬世耿輝餘慶爾誕徽音稟茲淑行藏
婦德載宣女師以鏡言歸王室作嬪君子聲
弘運屬七歲義尉終始帝曰周親維翰
顯茲錫履輜軒式耀寵服有章毋儀蕃國
祀嚴景淪芳許枚標慕傳引哀傷祖行
眇然松嶂蒼青輟驂夕寵罷吹晨局留
息男象寧世翼龍封杜陽王年十七天
日詔除寧遠將軍丹楊尹
妃張氏寶和年十九仁祖安之楊州王
亡父弘策車騎將軍兆陽縣侯
息恬年二十一

略論北魏《司馬悅墓誌》的書法

启 真

一九七九年在河南孟县出土的北魏《司馬悅墓誌》，是在书法艺术上很有价值的一件历史文物。它为富有创造性和美学价值的北朝碑版书法增添了新的珍贵资料，值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重视和研究。

《司馬悅墓誌》的书法特点和成就，必须联系北朝碑版书法的整个情况来看。南北朝时期，在南北两方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习、民族文化等情况的制约和影响之下，出现了“南帖”、“北碑”两大书法艺术潮流，它们呈现了各自的风格特色和形象特征，成为具有不同美学意义的两类书法艺术。现在单就“北碑”来说，在其发展中间，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由民间书手和刻石匠师合作创造的、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北魏造象记，奠定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典型风格和典型形象。其意义首先是在书法上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独特的风貌，它们的字体虽介于汉代分隶和魏晋真书之间，但对传统的分书或真书都有显著的突破，那种雄奇角出、外方里圆、华美挺拔的书法形象，能使人观感一新，不禁为北碑书法家竟能把汉字写成这样而为之惊喜。倘若没有优秀造象记在书法上的巨大创造，那么北朝书法将始终不过是传统的分书、真书的延续，不能成为一宗具有鲜明特色而足与南朝书法争奇比美的艺术财富。其次，在大量优秀造象记出现之后，其它碑版（碑碣、墓志、摩崖石刻等）的写刻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反映它的特色，因而整个碑版书法才在差异变化之中表现了美学特征上的统一，成为一股书法艺术潮流。

《司馬悅墓誌》制作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五一一年），它的书法同《龙门二十品》中的《长乐王夫人尉迟造象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年）、《元详造象记》（太和二十二年，四九八年）、

《杨大眼造象记》（宣武帝正始年间，五〇四—五〇七年）等名作极为相似，明显地体现了造象记所开创的典型风格。但是这种相似或一致，还不仅是一个书法问题，而是表现于整个写刻过程。因为龙门造象记之所以能创造前所未见的独特书体，除了书法上的创新发展这个因素之外，刻石匠师的刀法运用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造象记的书写者并非名人巨公，刻石者用不着一丝不苟地忠于书法原作，可以较为自由地运用刻刀来参与创造，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棱角锐利、外方里圆的点画与转折，构成雄奇角出的书法形象。这种写刻统一、相辅相成的做法，在《司馬悅墓誌》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试看《墓誌》中有许多字，其横竖笔道的起端都带有又尖又长的锋迹（横画锋迹向上，竖画锋迹向左）。如此尖长的锋迹显然不是露锋出笔造成的，而是刻石时由此入刀的痕迹。再则，《墓誌》也有些造象记一样，许多笔画是用单刀刻成的，这固然显示了刻石匠师用刀如笔的高超技艺，但同时也说明他本来就不意于一丝不苟地忠于书法原作，因为造象记和《司馬悅墓誌》中那么大的字，用单刀来刻，是无法严格再现原作笔画的。另外，在《墓誌》中还有一个微小而值得注意的痕迹，那就是第八行的“載”字，其中的长“乚”分成了两截，是用两笔写成。为什么要这样写？显然因为左下的“田”所占面积较大，如果一笔写下来，必然会与右“乚”的下角重合，使之不能棱角分明。第十二行“機”字的长“乚”就不是这种写法，因为在那里没有笔画重合的问题。“載”字长“乚”分成两截的写法固然并不足取，但从中却可见刻石匠师用刀法获致锐利的棱角，并非随便运刀自然形成，而是一种自觉追求的、为创作者本人所珍视的艺术效果。

由此一斑而窥全豹，可以推想魏碑书体的形成并不偶然，它乃是民间书手和刻石匠师不断积累实践经验而进行自觉的艺术创造的结果。

从制作年代上看，《司马悦墓志》是北朝墓志中较早接受造象记影响并体现其风格特征的。把它同多数北魏造象记相比，可以看出它在书法上比较精致，笔画和结体都更趋于规范化，象《始平公》、《郑长猷》等造象记中那种任性率意的样子，在这里是看不到了。但它仍充分表现了造象书法清新豪健的特点，在天趣浓郁这一点上，虽比某些造象记有所减杀，但在精美严谨上却显有进展。再把它同北朝后期以及隋代的一些著名墓志相比，则情况正好相反，即工整精细有所未及，而奔放自然却又过之。这是因为后期的多数墓志吸取造象书法的特点却使之高度规范化了，同时在南北交流中受南方书法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它们一方面在俊美严整上大大超过前期碑版，另一方面却逐步滋生了公式化的倾向，在写刻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负担，不免流于拘谨。总之，辩证地看《司马悦墓志》，可以说它不论同龙门的优秀造象记相比，或是同后期的精美墓志相比，都是既有不如它们的地方，又有胜过它们的地方。这也正是它的特点和价值之所在。

魏碑书体在北朝时期经历了新生、发展到完全成熟和定型的过程。当其新生之时，它是姿态新奇、天真罄露、纵跃自如，能给人以强烈印象的，但自然也带有粗朴、稚拙等特点；到了完全成熟时，它变得十分精美谨严，却又失去了新鲜活泼、生气蓬勃的意态。《司马悦墓志》可以说代表着上述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所以从积极方面来说，它是兼有优秀造象记和后期墓志的优点的，它的出现，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北朝碑版书法发展过程的了解。

《司马悦墓志》的书法形象刚健隽逸。它的笔画洗炼爽朗，气均力匀，在处处表现运锋着实的同时，也往往参用轻盈飘洒、灵活自然的笔墨，起到了很好的调剂和补衬作用。在结体上，它同多数魏碑名作一样，也以方严为尚。由于笔画之间搭配紧凑、救应巧妙，所以主体结构极为严密稳当。但又因笔道的装饰性部分往往向左、右或下方适当伸展，其笔墨未到之处又若有锋势波及，所以它在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里紧外舒、骨气洞达、精神内敛、潇洒大方。由于《墓志》出土未久，所以笔画锋芒俱在，形体棱角无损，这一点在传世法书中也是颇为难得的。

北魏 《司马悦墓志》

魏故持節督豫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潁陽縣開國子孫州刺史司馬悅墓誌
君諱悅字慶宗司州河內溫縣都鄉孝敬里人也故侍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貞王之孫故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司空公康王之第三子先是庶姓猶王封
瑯琊王故貞康二世並申上爵君稟靈和之純氣含確姿於岳瀆神識超暢玄鑒洞發
梗槩之風岐嶷而越倫卓尔之秀挺角而逸群臨難亮節建貞白之操所謂金聲玉振
之也年十四以道訓之胄入侍禁墀太和中司牧初開經詮望首以君地極海華器識
明斷擢拜主簿俄遷司空大將軍二府司馬讚務台鉉釐格地里
皇舉遷各筆建歲或登簡九元帝弟咸陽王以親賢之寄光舊司牧傳選典兵自外

明斷擢拜主簿俄遷司空大將軍二府司馬讚務台鉉整格地里
 皇舉遷洛肇建畿域澄簡九流帝弟咸陽王以親賢之寄光舊司牧博選英
 人地兼允莫居網任以君少播休譽令名茂實除寧朔將軍司州別駕翼佐徽猷風光
 治軌君識遵墳典連訓雍絹男降懿主女徽貴賓姻姪綱疊感聯紫掖出撫兩邦惠化
 流詠并收郢豫江黔被澤折騰籌略經謨周遠謀扶義陽略之隨陸廣卷三開開壇午
 里動績驟章再莅豫土豐機竊發禍起非慮春秋有七水平元年十月七日薨於豫
 州皇帝哀悼朝野悲歎死生有命脩桓定期斯賢而遇斯禍以其新拔衆寔可知遣
 中黃門維榮顯弔祭贈帛一千匹營護喪事越四年二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卜窆于
 溫縣西鄉嶺山之陽朝遣謁者榮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莊禮也乃刊幽石式昭
 芳列其辭曰
 赫赫洪宗振暉四海瑱根玉葉世為魏宰君承華液誕姿粹靈玄鑒洞照敏智早成在
 家孝睦忠塞王廷比王之潤方響金聲如彼孤松干雲乃青如彼皎固寒霧獨明肅警
 龍驤雨宮荷榮東閣西臺出處有聲分竹二邦化流民詠作牧郢豫威振邊城綏荒景
 附澤沾江氓功立名章宜享遐齡如何遭命迫然潛形卜定有期兆宅嶺山飛旌翩翩
 將寔幽壙局開既掩霜生離間式刊玄石永祀標賢

大魏永平四年歲在辛卯二月丁卯朔十五日辛巳建

北魏 《司馬悅墓志》 (局部)

允莫居網任以君少播休譽令名茂
 識遵墳典連訓雍絹男降懿主女徽

收對豫江黔被澤折勝籌略經謨周
驟章再莅豫土覺機竊發禍起非慮
帝哀悼朝野悲歎死生有命循桓定
維榮顯帛祭贈帛一千匹營護喪事
鄉嶺山之陽朝遣謁者榮贈平東將
辭曰
宗振暉四海瑱根玉葉世為魏宰君
忠塞王庭比王之潤方響金聲如彼
宮荷榮東閣西臺出處有聲分竹二
江岷功立名章宜享遐齡如何遭命
堙局開既掩霜生醴開式刊玄石永

唐《等慈寺碑》

马宝山

此碑在河南汜水县。高一丈零四寸，广四尺六寸。文为正楷书，共三十二行，每行六十五字。有篆书阳文碑额九字：《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

此碑无建立年月。据《中州金石记》注为贞观二年立，也有说为贞观三、四、五年立的。历代争论，不能确定。

唐太宗破窦建德于河南汜水。贞观三年十二月，诏命在战场胜地为殒身戎阵者建寺立碑，超度亡魂，颂扬战功。命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颜师古、褚亮、朱子奢等各撰碑铭，以纪功业。许敬宗撰普济寺碑，李百药撰正解寺碑，颜师古撰等慈寺碑等，则此碑之立，必系贞观三年以后之事。

此碑第三十二行末“颜师古奉敕”下缺一字，是奉敕“书”还是奉敕“撰”，不明。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为颜师古撰文。

等慈寺碑之书法方劲古茂，北朝书势甚浓，结体严密，笔力雄健，为唐楷书之上乘。而临抚此碑者较少，盖无人提倡之故，并非书法不佳。

此碑明以前拓本未见传世，只见清初拓本，有硃拓、墨拓两种，均为剪装本。硃拓者色重，墨拓者色浅，拓本皆用河南土产皮棉纸，纸为浅茶色，质虽粗，而韧力特强，不现帘纹。

清代早期拓本之第十三行“此焉摠获”之“焉”字，完好未少损，后无道光壬午隶书跋。刻跋时“焉”字已少损。咸丰初年“焉”字只见末笔三点。

本文所引用之拓本即为咸丰初年拓本。

